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构想

刘 勇,李 怡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文学编年史著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价值的文学编年史都不是原始材料的无限罗列,而是包含了著者诸多深刻的学术思想与良苦的学术用心。“变中有常”的中国谱系学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文学编年史构建的基础理论。我们理想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应该从中国文学发生历史性新变的晚清时代开始,一直编写到“现代”结束、“当代”开始的时刻。它将自觉致力于发现被以往诸多文学史忽略的文学细节,并纠正以往文学史中存在的一些讹误。

【关键词】 文学编年史;中国谱系学;历史细节

【中图分类号】 I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5)03-0071-07

编年史,顾名思义也就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历史记录方式。编年史的写作,中外并见,既是中国自己的一种传统,也是西方古典时代就存在的叙述方式,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公元17年)的《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5—120年)的《编年史》和中国的《春秋》、《左传》及《资治通鉴》等都属于著名的编年史经典。《春秋》被称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被誉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则是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而文学编年史的写作始于近现代人的自觉探求,历史学家陈寅恪建议文学研究不妨借鉴“史家长编之所为”,“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①我们理解,这就是文学编年史的主要意义和基本框架。

一、文学编年与“重写文学史”

近年来,随着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研究的不断走向深入和成熟,学界出现了多部文学编年史。2006年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编

年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著述上至周秦,下迄当代,共分十八卷,每卷约80万字,总计1400万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史,其中於可训主持的现当代部分也是迄今最详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通史。在这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张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2012)、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2013)、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2013)、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2013)及卓如、鲁湘元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2013)等多部文学编年史的著作。而从上述这些著作的编辑撰写情况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更迭,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走向深入与成熟,文学编年史书写的范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彰显出新的发展势头,并有不断升温的态势。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文学编年史著作呢?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工程”密切相关。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本身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新时期以来持续不断的“重写”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曾经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90年代出现过三次

【收稿日期】 2014-10-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谱系学研究”(14BZW135)。

①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页。

大的高潮。50年代是响应教育部将“中国新文学”纳入大学中文系课程的需要,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及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代表;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启蒙的大潮,“重写文学史”蔚然成风。如果说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承上启下的成果,那么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则是开拓创新的展示,其他如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郭志刚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朱寨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等等构成了文学史写作的繁盛景观;90年代文学史写作更加多元化,继续追踪文学研究动态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以及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分别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著的经典之作,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则开启关注文学生产体制的新格局。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史的写作基本上沿袭了90年代的多元化方向,不断拓展新的叙述空间,程光炜、刘勇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现代文学30年的时间划分上作了前所未有的尝试,以1937年全面抗战为分水岭,将中国现代文学分为前后两大阶段;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一次系统勾勒了雅文学主流之外的通俗文学的世界;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位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再次说明了学界对现代文学起始时间的重视;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代表了其从外部视角、从作家的“原生态”生活中寻绎文学发展线索的努力。另外,新世纪以来,还出现了多部文学通史,如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2003)、朱寿桐的《汉语新文学通史》(2010)、郭预衡、郭英德等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2013)、张炯、邓绍基等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2013)等。这些“文学通史”一再显示出学术界力图打通中国古、近、现当代文学的积极努力,其中张炯、邓绍基等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全书12卷本,时间从先秦一直贯通到当代,体现出一种融古化今的“史诗”风度与气魄,是上述努力的一个集中代表。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之所以一再“拓展”,一再更新,乃是内蕴着编纂者试图摆脱“以论代史”叙述模

式的不懈努力,因为多年来,“以论代史”的叙事模式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编纂者的文学史叙述。因此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潮流的继续表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也和“重写文学史”思潮一样充满“拨乱反正”的意味,经过多少年“以论代史”的干扰,我们对于“文学”历史的诸多基本情况——作家作品与期刊图书出版的基本情况本身其实是相当隔膜的,仅仅是“论”的展示并不足以揭示文学的历史演进,不足以还原文学历史的真相,“编年史”的价值可能正在这里,它力求将文学的发展还原为一系列最基本的文学现象的素朴的呈现,尽可能真实地告诉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新诗编年史》的著者刘福春先生曾经感慨道,目前出版的中国新诗著作,算上全部有名目的诗歌出版物,也不到他所掌握的数量的一半,如此比例的研究基础,实在令人质疑不断。所以,从进入中国新诗研究的那一天开始,刘福春先生就另辟蹊径,将主要的精力置于中国新诗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之中,先后为我们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中国当代新诗编年史(1966—1976)》、《中国新诗书刊总目》等系列著作,一步一个脚印地为我们积累着中国新诗历史的点滴史料,201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可以说就是这数十年心血的结晶,在快要迎来百年诞辰的时候,中国新诗终于有了自己厚重的档案和家谱,不能不说这真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当然,随着当代文学持续不断的发展,随着现代文学领域不时出现对“新文学主流”、“雅文学主流”、“白话文学主流”长期“独占”历史的质疑,文学史写作似乎也出现了一种逾越边界或者说模糊边界与范围的可能,以致引发了另外一类疑虑:仅仅只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否应该不断扩大我们的写作面积?是不是以时间为线索的编年史写作就成了可以收罗一切文学现象的框架?

其实,正如我们从来也不曾有过放弃主观思想认识的历史叙述一样,文学史的写作从来都不可能是不偏不倚、客观中性的材料完善工作,因为材料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无法真正完结的活动,何况对于同样的材料,如何挑选、如何陈述依然是一种“态度”的结果,史料与史识的协调配合才是文学史写作的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看,所谓“重写文学

史”并不就是叙述范围的不断扩大——从新文学扩大到旧文学,从雅正文学扩大到通俗文学,从各种可见的“地上文学”扩大到犄角旮旯里的“地下文学”……编年史的出现也不能够简单理解为是这一“扩军”过程的理所当然的产物。

在我们看来,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从来都是史识与史实的同时建构,对“以论代史”的突破最终依靠的并不只是一大堆的史料,同时也需要更坚实有力的创新思想,更具有启发意义的历史思想。在透过新的思想扩大我们的认知范畴之后,在新的认识框架拓展了文学视野之后,等待我们的工作恰恰是回过头来,切实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历史内涵与特点,重新确立现代文学的经典,重新梳理现代文学的历史逻辑,重新解释现代文学自己的传统。在新的历史经典的构建之中,所谓的“多元标准”并不意味着毫无原则地容纳一切,“多元”并不能够成为没有标准的理由。正如温儒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基本的价值标准放弃了,表面上似乎包容一切,结果呢,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连起码的学术对话也难于进行,只好自说自话。过去是一个声音太过单调,全都得按照某种既定的政治标准来研究,学术创造的通道被堵上了;现在则放开了,自由多了,但如果缺少基本的评判标准,‘多元化’也只落下个众声喧哗,表面热闹,却无助于争鸣砥砺,还会淹没那些独特的学术发现。”^①

最近几年,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有价值的文学编年史都不是原始材料的无限罗列,其中显然包含了著者深刻的学术思想与良苦的学术用心。比如,中国新诗尤其是当代中国诗歌常常受制于各种“非艺术”的社会事件,包括政治生活事件,也包括私人生活事件,“以论代史”的诗歌史常常是将文学艺术注解为一系列国家形势的反映,而总是忽略这些国家大事背后的异样人生与复杂生态。刘福春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缺失,所以他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将大量的篇幅花在“文学周边”的一些事件或者活动上,比如某些文坛官司的来龙去脉,还有不少的作家日记,有张光年日记、陈白尘日记、郭小川日记

等等,这些日记折射出当时诗人的生活状态和遭遇,这些表面看来好象跟诗人的创作没有关系——他哪天做检讨了、哪天被谈话了——但实际上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诗歌的生存,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生存下来的。这都是今天诗歌的生态环境,是当代文化、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场景。在这个意义上,刘福春先生的编年史其实展示的又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生态景观汇编,是中国诗歌的生态史。当我们的史家能够将诗歌发展的生态环境和作家的文字创作联系在一起,寻找两者之间很好的映衬、说明,我们觉得的确能够“还原”出我们诗歌发展百年来的非常重要的细节,而且这些细节带给我们的也不再是一些干枯的文字符号,而是以新的思想智慧烛照我们发现历史的道路,是以论者的思想高度吸引我们重新进入历史情境,感同身受地体验中国新诗的时代与氛围。这样的处理和安排,显然又是一般的文学史所不容易做到的。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不仅仅以副标题的形式特别标明这并非一部泛泛的文学大事记,而是“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相当个人化和具体化的历史叙述,在“总序”中,更有明确的思想提示:“更重要的是,全书条目的选择与叙述,都暗含着我们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些基本关系的持续关注,如文学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关系,文学与出版、教育、学术……的发展,等等,都形成了我们的历史叙述中的内在线索,看似散漫无序、时断时续,但有心的读者是不难看出其间的蛛丝马迹的。”“‘个人文学生命史’应该是文学史的主体,某种程度上文学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文学生命的故事连缀而成的。文学史就是讲故事,而且是带有个人生命体温的故事。”^②

二、文学编年与文学的价值判断

从上文的分析中,不难发现,虽然文学编年史是大文学史框架下对于文学脉络的细部清理和整体呈现,是整个文学史建构和文学研究当中最为基础的工作,但它却绝不仅仅只是文学史材料的简单或者僵化的罗列,文学编年史还应该是目前文学史研究最基本的文学发展史料的有机组织。但它又

① 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②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总序》,《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与一般的文学史论著有所不同。相对而言,文学史更多是受到某种文学理念甚至是文学外部的观念所支配的,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本身在长期以来的建构过程当中,就因为不同文学史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导致了对于一些作家、作品或者文学现象的选择性舍弃或者突出,因此也造成了相关文学史在作家、作品的价值评判方面的巨大差异。

文学编年史本身,当然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它的判断不能直接表现为文学现象的筛选,当然更不能转化成一系列明确的论述,编年史的存在形态就是以时间为单位,将某一时间段发生的文学事件、产生的文学作品客观呈现出来。它主要通过文献史料本身的整理铺排来展示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这一意义讲,当文学史写作和研究模式出现某种“瓶颈”状态或胶着状态之时,重新返回大量的历史事实之中,再寻线索,再见逻辑,对于文学史写作和研究可能就是一种给养和补充。这就如同对于作家的研究而言,作家年谱的出现或新版,都具有重要的推进意义,因为,和一般的作家论及作品研究不一样,作家年谱不仅注重对于作家个人相关史料的铺陈展现,更注重一些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的客观陈述。作家年谱是作家研究最为基础、基本的工作,但它的问世却不是最初级的工作的结果,恰恰相反,作家年谱的写作,往往标志着一些重要作家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我们可以注意到,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相应的年谱整理,而是在这些作家的作品本身得到了肯定并被不同的观念进行阐释之后,当学术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一个更加客观的参照系来重新回首历史、反观相关的相关问题和争议,年谱写作的任务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种对于最基础的材料回归,可以说不是一般的材料的整理,而是作家和文学研究的再出发。从这一点来看,文学编年史和作家年谱写作具有类似的学术功能,也是对于文学史写作的一种深层的推进。

与一般的史料汇编不同,文学编年史依然包含

着编著者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虽然不是那种长篇大论的思想定义和概念阐述,却应该包含着或者说提示着著者对历史内在逻辑的理解。只是这种理解和逻辑的呈现并不是通过文学史观念和阐释来达到,而是更多通过具体的材料本身以及材料的有序、有机排列呈现出来,归根结底就是对文学“谱系”的一种梳理和解读。

今天学界对“谱系”这一概念的运用主要受到西方现代谱系学的影响,特别是福柯对于“谱系学”的解释。而福柯反对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具有本质意义、连续性的东西,他对“谱系”的理解恰恰重在那些历史背后的断裂性、差异性和偶然留意那些边缘存在和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它要发现,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①这固然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现象丰富意味的重视,但是却也可能导向另外一个后果,即历史可能由此被我们理解为混沌、迷乱的一团,根本没有寻找规律的必要。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念依然有它值得借鉴之处。古代中国自己也拥有关于谱系的知识,这一知识更加注重历史性、秩序性和考据性。当然这主要是为了加固传统礼教、秩序和价值观,如果今天的文学史家能够摒弃其中僵化的礼教的价值观,汲取对于历史“变中有常”的辩证认识,那么我们对历史的梳理就可能既注意细节的丰富,又不放弃对历史大方向演变的探索,从而确立现代中国自己的历史谱系理论。在这种观念下,就是不把历史看作无序的堆砌,而是承认在纵横交错、四方融汇、相互关联之中,有着某种清晰的变化发展的流脉,留意于这些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立体地观照着事物多层面的复杂关联,方能深刻地揭示着事物自身的特质^②。

“变中有常”的中国谱系学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我们文学编年史构建的基础理论。我们需要尊重历史过程的种种偶然、种种的“变量”,需要对这些变化的细节作出尽可能详尽的梳理;同时,处理这些历史材料的方式又不应当是漫不经心的,对于晚清至20世纪的文学发展,我们显然存在

① [法]米歇尔·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载汪民安、陈永国编:《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② 参见刘勇:《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思考——兼论〈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自己的理解和观察,有必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呈现来传达我们的基本认识。例如,晚清到民国前十年,是历史运动变化多端的时期,新与旧、外来与传统、白话与文言、雅与俗都在竞相表现,争夺话语空间,这一段历史以“编年”的方式呈现出来将最大可能地揭示出一个变动的年代中国文学曾经有过多么不同的演变可能,也拥有多么丰富的历史资源。但是,仅仅呈现这些历史材料的丰富就足够了吗?文学史究竟最终是选择了“新文化—新文学”的道路,这样的道路也不是个别人的心血来潮,在根本上说,是历史合力最终形成的结果。那么,这些历史“合力”又包含了哪些因素呢?这些因素后来又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们就不得不特别留意历史复杂演变过程之中各种“新质”如何发生,如何聚少成多,如何从偶然、边缘到必然、中心的变化过程。这样的“编年”,就能够提醒大家注意历史演化过程中那些举足轻重的环节,为解释历史的重大转折提供思路。

兼顾历史的偶发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同样在其他年代得以表现。例如民国建立以后,北洋势力、国民党势力与共产党势力各自对文学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围绕这些政治力量的文学形态与文学政策如何?在左翼文化发展的线索之外,我们的视野必须开阔,开阔的视野才能纳入更多的历史现象,但是,再丰富的现象也不能改变左翼文化在事实上占据现代文学主体的历史格局;在抗战时期文学的梳理中,我们一度将注意力完全放在“抗战主题”的文学上,对于“与抗战无关”或关系较远的现象多有忽略,这就无法展示抗战之于中国作家的丰富影响了。其实,除了主题的抗战,真正的“抗战”常常融进了作家的日常生活,就是那些貌似“与抗战无关”的作品,骨子里面也因为“发生在抗战时期”而与这段历史密切关联,我们有必要在“广义抗战”的背景上尽力呈现这些丰富的材料,同时,也细致地辨析中国文学如何通过这一段历史的考验迈向成熟^①。

当然,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绝不会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编年,只能以我们的方式进行。因为,出于不同的历史认知,当然也就存在不同的历史编年模式,未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肯定会

在多种形态的共生与对话中走向成熟,共同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

三、文学编年的形态与特征

那么,我们理想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应该具有怎样的形态,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在我们看来,一部规模足够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应该从中国文学发生历史性新变的晚清时代开始,一直编写到“现代”结束、“当代”开始的时刻。就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时间节点而论,就是纪事历述自晚清的1895年1月开始,至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夕的1949年6月,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实都应该尽力追踪、描述。内容包括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作家行踪、文学活动、文学思潮、文学出版、主要文学作品的基本情况等等。

一套初具规模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套编年史应该紧随学界对清末民初文学日渐重视的发展态势,因此应将编写的起始时间定于1895年,并积极致力于对清末民初文学中一些细部史料的挖掘与钩沉。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还原清末民初文学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也为清末民初文学的研究者提供真实确凿的文学史料。比如鸳鸯蝴蝶派,这是由清末民初言情小说发展而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也是被新文学先驱者们痛加针砭与批判的一个文学派别。但通过学界多年的研究、梳理已经发现,鸳鸯蝴蝶派并不是像新文学作家贬斥的那样毫无价值。事实上,《礼拜六》前100期不仅注重作品的质量,还在装帧设计上追求美观。《礼拜六》杂志是32开本,每册约30至40页。既有一定的份量,又比较小巧,便于携带。杂志的封面从第3期开始采用水彩画。前百期《礼拜六》封面的水彩画主要出自丁悚之手。丁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画家,他的绘画兼具中西技法。他为《礼拜六》绘制的封面既表现了深厚的西画造诣,同时又具有中国画传统的线描功力,即使以今人的艺术观点来看,其中不少作品仍不失为珍贵的绘画佳作。从绘画的内容来看,以仕女图居多,也有漫画

^① 参见李怡:《战时复杂生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熟——现代大文学史观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

和山水画。仕女图是《礼拜六》封面中最有特色的。丁悚笔下的仕女图俊美雅静,色彩清丽,比起今天的某些封面女郎似乎更少造作之气。而且丁悚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超越了古代仕女图仅画仕女、佳人的题材局限,将描绘的对象扩大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至太太小姐,下至村姑女佣,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民国初年社会生活中各阶层女性的生活图景。因此这些作品既是精美的杂志封面,也是研究民国社会中市井生活的珍贵材料。另外,《礼拜六》封面上的刊名题字也讲究美观和变化多样,曾给前百期《礼拜六》题写刊名的人有王钝根、叶中冷、吴芝瑛、张聿光、张丹斧、姚雏、王大错、刘海粟等。由于从策划到实际运作都满足了广大市民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消费心理,前百期《礼拜六》在民初市民文学杂志中迅速地脱颖而出。发行第2期销数就达一万余册,发行第3期销数骤增至一万七千余册,后来销数最高达到了两万余册。在一般文学期刊销量仅有一两千册的民初杂志界,《礼拜六》真可谓鸡群之鹤^①。周瘦鹃在《闲话〈礼拜六〉》一文中描绘了当年《礼拜六》深受读者欢迎的场面:“《礼拜六》曾经风行一时,每逢星期六清早,发行《礼拜六》的中华图书馆门前,就有许多读者在等候着。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去购买。这情况倒像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②现代出版家张静庐回忆起自己迷恋小说的少年时代也不由地感叹:“《礼拜六》在这时代真是再红也没有的刊物。”^③由此可见,当时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并非只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工具(《文学研究会宣言》),其观念也并非仅仅是“金钱主义”的^④。而实际上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凝聚着创作者们许多的心血,是民国时期市民文学兴起的重要标志。所以,我们不能简单依赖传统文学史的叙述,断定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就是媚俗低级,而应该深入其细部进行详尽的考量,这样才能还其一个真实的面目。

第二,这样的编年史应当自觉致力于发现被以

往诸多文学史忽略的文学细节,为今后的文学史编纂提供有效的补充与参照。比如在先前的许多文学史中,常常涉猎的是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民主”、“科学”的概念和他的“三大主义”,而忽视了陈独秀在其他方面的重要功绩。事实上,陈独秀对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如陈独秀1915年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对于教育问题的探讨,他认为:“教育家之整理教育,其术至广,而大别为三:一曰教育之对象,一曰教育之方针,一曰教育之方法。教育之对象者,即受教育者之生理及心理的性质也;教育之方针者,应采何主义以为归宿也;教育之方法者,应若何教授陶冶以实施此方针也。三者之中,以教育之方针为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舵。不此是图,其他设施,悉无意识。”文中还对教育的意义做了说明:“窃以理无绝对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废。吾人所需于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以吾昏惰积弱之民,谋教育之方针,计惟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易词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外览列强之大势,内鉴国势之要求,今日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⑤另外,陈独秀在《1916年》一文中,对纲常名教进行猛烈的批判,对“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的热情呼吁^⑥;在《吾人最后之觉醒》一文中,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大力宣传,对人民积极参与政治,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闲人政治”的积极倡导等等^⑦,这些观点都对中国新文学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就无法对陈独秀其人其事作出全面的理解与把握。

第三,通过编年史的撰写,我们可以还纠正以往诸多文学史中存在的一些讹误。比如在以往许

① 参见刘铁群:《〈礼拜六〉:民初市民文学期刊的代表作》,《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② 周瘦鹃:《闲话〈礼拜六〉》,《花前新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2页。

③ 周瘦鹃:《〈礼拜六〉旧话》,《工商新闻》副刊《礼拜六》,1928年8月25日。

④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

⑤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

⑥ 陈独秀:《1916年》,载1916年1月15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

⑦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6号。

多的文学史叙述中似乎白话文很容易就战胜了文言文,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坛上的位置,可是通过对资料展开充分的查找与梳理之后,人们不难发现,实际上白话取代文言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据资料记载,胡适的白话文运动,在提倡之初不仅遭到了梅觐庄、任叔永等人的激烈反对,而且五四先驱者们自身对于如何实现“文言合一”意见也并不一致。胡适主张“八不”主义,钱玄同则赞同“纯为白描,不用一典”,主张“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释”,而傅斯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言合一草议》一文,提出应“以白话为本,而去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乃吾所谓用白话”,而用白话作材料,即“取白话为素质,而以文词所特有者补齐未有”。^①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第一个十年许多新文学作家在反对文言的同时,而在其作品中还依然有大量的文言词汇出现。以往我们常常将其视为新文学作家一时之间还不能更好地脱离传统而存在,而事实则是许多新文学作家在倡导使用白话进行创作的同时,根本就没有打算放弃使用文言。

这样的呈现一方面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在另外一方面也应该体现编写者自觉的学术追求:编年史

的书写意图是为了不让那些真实的文学细节湮没在历史中,但只有对历史严肃认真的思考才能有效地处理这样的细节问题,否则极有可能会产生以细节湮没细节、以历史湮没历史的严重后果。所以在撰写编年史时,我们当尽量追求具体和翔实,也尽量做到以最客观的态度呈现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原始风貌,希冀能够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更为完备的讲述方式,而不仅提供史的大型框架,更提供丰富的真实细节。

总之,我们理想中的现代文学编年史应该体现新一代学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的努力和开拓,虽然任何一种“编年史”也不能做到真正的“全面精确”,肯定最终都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稚嫩与疏漏,但是,一个具有自觉的学科建设意图的努力都会获得应有的回报,究竟这样的努力是在我们学科发展的方向上成为有意义的一步,所有的努力和所有的疏漏一起都能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基础,在不断的借鉴和不断的反省批判中实现新的学术突破。

文学编年史不仅仅是文学历史的编年,更是历史现场的探视,是历史瞬间的把握,是历史细节的感悟。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侯珂)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Bluepri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hronicles

LIU Yong, LI Y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chronicles constitute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writing project” of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In fact, valuable literary chronicles are not simply collections of endless raw materials; rather, they conceive deep academic thoughts and motivations of the compilers. Historicall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 of “constancy in change” in pedigree is to a large extent able to be adopted as the fundamental theory per se. From that point of departure, the ideal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hronicles” should start from later Qing Dynasty when Chinese literature took historic reform then and continues up till now. Moreover, it should devote itself to those literary details overlooked in previous literature history stud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ctify the errors and mistakes in them.

Key words: literary chronicle; Chinese pedigree; historical detail

^① 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载1918年2月15日《新青年》,4卷2号。